

王俊义 著

俊义文存

下
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俊义 著

俊
义
文
存

下
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卷 四

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研究

对 80 年代“文化热”的评价与思考	(779)
试析文化史研究中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	(795)
文献传说与考古发掘相结合是推进研究的关键	
——有关黄帝的文献资料及研究状况述评	(809)
河洛文化的内涵、地域界定及其他	
——从地域文化研究谈到《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	(819)
讴歌轩辕黄帝的前驱先路之作	
——罗光平《东方大帝》序言	(827)
弘扬炎帝精神 振兴中华民族	
——为宝鸡“炎帝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而作	(832)
山西长治、高平炎帝遗址考察散记	(843)
对“炎帝故里在会同”新说之浅见	
——炎帝故里及炎帝文化发源地的讨论	(856)
对随州炎帝文化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869)
炎黄雄姿存天地 凝聚四海赤子心	
——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落成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878)

探索中华文明 研究颛顼帝喾

- 从《五帝本纪》到《五帝时代研究》 (883)

黄帝祭祀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 兼论“公祭黄帝是宗教活动吗?” (890)

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 新版《炎黄文化研究》主编寄语 (893)

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 (896)

辛亥革命前后尊黄思潮的演变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907)

不要忽视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 在《黄帝传》座谈会上的发言 (913)

《炎黄文化研究》的生存与发展 (916)

发扬敬业传统 加强职业道德 (919)

一位世纪学人的文化情怀

- 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论解读 (926)

关于设立“中华文化优秀著作奖”的由来、目的和意义 (941)

世纪之交研讨中华文化的盛会

- “中华文化与廿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946)

美国博士研究生培养一瞥

- 赴美讲学之点滴感受 (953)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促进中日友好交流

- 中华文化研究会的宗旨及中日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之

- 开展 (959)

中国近代思想之林

-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缘起及其特色和价值 (965)

卷 五

文史评说与人物纪念

- 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971)

- 历史文化遗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978)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	(989)
《徽州学概论》序	(1006)
筚路蓝缕 开拓创新	
——《中国流氓史》序	(1010)
《徐州自然灾害史》序	(1015)
中华民族文化综合研究的新成果	(1019)
荟萃百家 撷采众长	
——《中华杂经集成》评介	(1023)
推进史学繁荣、缓解出版难的有益创举	
——写在《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出版之际	(1025)
《学术随笔文丛》出版前言	(1027)
学术出版社要有学术大家支撑	
——追忆《学术随笔文丛》出版前后	(1029)
学博思精 大家风范	
——读《清园夜读》(增订本)有感	(1035)
刚正不阿 坚持真理	
——读《黎澍十年祭》	(1037)
一部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优秀历史教材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读后	(1040)
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刘志霄著《维吾尔族历史》(中编)评介	(1047)
一位美国友人笔下的吴晗	
——关于《时代之子吴晗》	(1051)
苏秦联姻说考辨	(1053)
郑和下西洋	(1056)
清代名人在宣南二则	(1059)
鲁迅与姚克	(1071)
再说鲁迅与姚克	
——对《关于鲁迅丧事情况》的补正	(1076)
保持学术品牌 不断开拓创新	
——祝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建社二十五周年	(1081)

郭影秋传	(1083)
缅怀郭影秋校长对我的教诲和影响	(1105)
哀思无尽忆费老	(1115)
怀念胡华老师的教诲及其党史人生	(1118)
怀念历史学家袁定中	(1125)
回顾与思治先生的交往及其治学风范	(1131)
祁龙威先生学术之树常青	(1136)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心香一瓣祭祁公	(1141)
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深切怀念我的慈母	(1146)
清史研究所成立前后	
——接受人民大学校史中心访谈	(1164)
《口述自传丛书》出版前言	(1173)
《往事漫忆》的《前言》与《后记》	(1175)
后记	(1181)

附 录

王俊义先生与清史研究	黄爱平 (1185)
河南省封丘县电视台录制专题片	
——《魅力封丘·人物篇》清史专家王俊义	(1201)
王俊义著作和编著目录	(1207)

卷 四

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研究

对 80 年代“文化热”的评价与思考*

一 对起因与状况的分析和评价

80 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文化热”，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兴起了一股汹涌的文化热潮呢？

任何一次社会思潮的兴起，无不有其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历史步入近代以来，曾相继出现过几次程度不同的“文化热”，影响突出的如戊戌启蒙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社会思潮的反映，都发生在历史的转折时期。80 年代的“文化热”，同样也产生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转折时期——一个以改革和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

新的历史时期带来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化。社会的巨大变化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以推动客观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这是 80 年代“文化热”发生的根本原因。如做具体分析，则有以下几方面的动因：

第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表明：伴随经济建设高潮的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必接踵而起。仅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为例，1956 年我国曾出现经济建设高潮，同时有征兆表明，即将出现文化建设高潮。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继之周恩来同志所作的“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科学、艺术的指导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都是基于对客观形势的估计，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到来。不料，随即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运动，直至爆发贻害无穷的

* 本文乃与房德邻教授合撰。

“文化大革命”。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既严重破坏了经济建设，也使本该出现的文化建设高潮被抑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才终于出现。如何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出发，批判地吸收外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成果，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客观形势，迫使文化思想理论工作者，重视和研究文化问题。

第二，是改革和开放的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和开放是新时期的基本国策。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也相应产生，然而却与人们多年来形成的陈旧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诸如锐意革新与因循守旧，政治民主与个人专断，按劳分配和平均主义等。旧的思想、观念、意识、习惯，乃至思维方式，都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和障碍。因此，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进行思想文化的更新，便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再者，由于实行对外开放，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人文科学，必然被引进和传入。于是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又被重新提出。不过，这与五四时期提出此一问题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五四时期，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同当时影响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继而又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即无产阶级文化形态同资产阶级文化形态的冲突。无论是哪种冲突，都同改造当时腐朽落后的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当时的中西文化关系具有全面的对抗性。而80年代的中国，尽管经济上还比较落后，政治体制也不尽完善，但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先进的，同时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形态——无产阶级文化，也是先进的文化形态，它善于吸收一切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这就决定了80年代中西文化关系的主导方面是互相交流，而不是互相对抗。唯其如此，积极引进当代西方某些先进的科技文化，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形成这次“文化热”的重要“热源”。当然也不是说现在中西文化关系就没有冲突的一面。冲突仍是客观存在，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还很尖锐，情况也较为复杂，因为资产阶级文化具有两重性。当前，中西文化关系的冲突主要有两方面：既有现存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某些进步方面的冲突；也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新文化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腐朽面的冲突。因此，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现代文化仍然是一个

严肃的课题，它要求文化思想工作者勇于探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解答。

第三，则与人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反思”相联系。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和失误，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空前的浩劫，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思。在历史的反思中，人们痛切感到“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极端个人迷信，家长制作风，愚民政策，自我封锁等各种荒唐事情，都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遗毒密切相关。因此，粉碎“四人帮”不久，思想理论界，即率先起来批判中国封建文化，期望在现实生活中清除封建主义的余毒和影响，接着反思的范围扩展到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历史原因的探讨，以及如何评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研究。文化研究的范围，逐渐从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扩展到对资产阶级文化的评价，以及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

第四，是学术研究发展本身的要求。我国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也有研究文化思想的优良传统。及至近代，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先后传入，又出现以资产阶级观点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从 1911 年至 1949 年，先后出版有中国文化史的著作达一百多种。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化研究异常冷落，称得上是文化史的著作寥若晨星，至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学则无人问津。粉碎“四人帮”之后，思想学术界逐渐活跃，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薄弱环节，与空白之处，渐为人们关注。一向受到冷遇的文化史与“文化学”，势必破土复苏。与此同时，近三四十年来，文化学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发展十分迅速，在对外开放的局面下，世界性的文化热潮，对我国学术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推动了国内“文化热”的兴起。

各种因素的汇集，遂促成 80 年代出现了汹涌的文化热潮。足见，80 年代“文化热”的兴起，有着广阔的历史背景，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时代特色。

80 年代在学术界兴起的“文化热”主要表现在，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如“中国文化史研究者座谈会”“中国近代文化史讨论会”“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讨论会”“首届国际中国文化艺术讨论会”……通过各种学术座谈会、讨论会，对文化方面的问题进行

了广泛的探讨，既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也形成了重视和加强文化研究的舆论和声势。此外，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单位，陆续成立起一批研究文化的机构和团体，如“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并由这些机构创办了一些文化学科的研究刊物，如《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国学集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国近代文化问题》等。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刊物的创办，初步形成了研究队伍，开辟了研究阵地。再者，全国不少报刊都曾开辟专栏，诸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论坛”“中外文化研究”等，开展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同时，几家有影响的出版社也争相推出“文化丛书”，如《中国文化丛书》《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文化哲学丛书》《现代思想文化译丛》等。在报刊专栏，及各种专刊和丛书的组织推动下，有关文化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仅1985年至1986年公开发表研究文化的论著，即达二百多篇、部。而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中，出版的文化史论著却屈指可数。从参加“文化热”研究的成员看，既有老一代专家和中青年学者，也有热衷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西方汉学家，还有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港台学者和外籍华人学者，具有广泛的研究者基础。事实说明，前几年的确出现了“文化热”。对此，有人提出质疑说，“文化热在哪里？”“所谓‘文化热’只是一种假象”“只是赶时髦，刮一阵风，造一通声势”^①而已。这种看法未免有些偏颇，不能因为“文化热”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便否认“文化热”的存在和已取得的成绩。

综观各种讨论会和已发表的有关论著看，这次“文化热”主要研讨了如下几方面的问题：①文化及文化的定义、对象、结构、范围等一般文化理论问题；②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探讨了中西文化各自的特征和优劣；③宏观考察中国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核心及其发展演变规律；④研究探讨某种文化专史、专题或某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如《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甲骨学史》《中国的陶瓷艺术》《禅宗与中国文化》《经学与中国文化》《国民性探析》等；⑤围绕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主题，

① 降大纆：《文化研究十五问》，《晋阳学刊》1987年第1期。

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关系。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虽未必概括了所讨论的问题的全部，却亦说明了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并涌现出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还从未如此热烈、活跃、畅所欲言地讨论文化问题。这次“文化热”的成果与影响，为今后深入进行文化研究开辟了良好的开端，预示了文化学科将走向勃兴和繁荣。

但也必须指出，这次“文化热”中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还只是初步的，已发表的某些看法，并非都是悉心研究的结果，有的带有随感性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次“文化热”期间，也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之际，自由化思潮中散布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历史、文艺、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文化方面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因此要使“文化热”健康而持续地深入开展，有必要对讨论中反映和涉及的问题，审慎分析，认真探讨和思考。

二 对几个问题的探讨和思考

（一）关于研究文化的指导理论问题

究竟以什么样的理论观点为指导，是文化研究能否深入开展的关键所在。我们说研究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似乎不成问题，实则远非如此简单。一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不很准确，有时表现出教条主义和某些机械与偏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关文化的论述研究尤其薄弱，再由于林彪、“四人帮”曾以极左的面目，肆意歪曲、践踏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导致一些不成熟的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和“逆反心理”，滋长了非理性主义倾向。再加上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社会上出现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诸如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僵化论”“真理多元论”“分科代替论”等荒谬论调，都还有一定市场。在“怀疑风”“否定论”甚嚣尘上时，一些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只能作为一个学派看待，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领导。在“文化热”中，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学的论述视而不见，否定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还有些

中青年文化研究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读了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理论，诸如文化哲学、符号学及文化人类学原理等，便将这些未经消化的西方文化理论、名词概念，囫圇吞枣地搬用于文化研究，甚至只是简单地重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却认为自己在构建新的文化体系。事实说明，对文化问题的研究确实存在着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或者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理论为指导这样根本性的尖锐问题。

联系到“文化热”中对一些问题的具体讨论，也确实有些观点不符合或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譬如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自五四以来就出现过以胡适为代表的彻底否定传统、崇洋媚外的“全盘西化”论，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企图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实践，早已证明此路不通。然而，在80年代的今天，却仍然有人老调重弹，赤裸裸地宣扬“全盘西化”论，也有人将“全盘西化”论变作“西体中用”，提法虽有不同，实质并无两样，仍然是主张“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整个上层建筑统统搬到中国来”。所谓“西体中用”的提法，岂不是像严复曾批判“中体西用”如同“牛体马用”一样可笑。再如“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遗产（包括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列宁和毛泽东尤其有精辟的论述，但在“文化热”中却有人斥责“批判继承”是“中庸观点”，是“不科学的”，是离开“系统整体立场”的“零散评价”，他们主张“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态”“根本改变和彻底重建中国文化”“要反传统，要全力动摇、瓦解、震荡和清除旧传统”。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做具体分析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观，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

我们说文化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主要是指在文化研究中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照搬照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概念。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论断和个别词句，绝非灵丹妙药。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却万古长青，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以“文化热”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讨论为例。

有人认为其主要特征是封闭性，也有人认为是兼容性。其实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带有片面性，缺乏唯物辩证的分析。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①（指狭义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时代的文化，主要是中国封建经济、封建政治的反映。中国的封建经济是封闭性的自然经济，建筑在其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就不能不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当然，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的封闭性，乃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竞争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开放性文化而言，如无这种比较，则无所谓封闭性。另外，观念形态的文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就文化本身的特性说，它是交流的，而不是封闭的，因为任何文化现象都是人类在某种范围中交流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具有兼容性、开放性。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性和兼容性这样的两重性。所以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涌来之后，中西文化既有冲突，也有交融，从而形成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文化形态。我们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对诸多文化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

我们说开展文化问题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还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本身，就是两千多年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总结。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文化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师们，有许多极重要的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无产阶级文化》《新民主主义论》等，其中既有对文化问题原则性的理论阐述，也有对具体文化现象的论断与评价，对我们开展文化问题的研究具有更加直接的指导意义。

总之，文化研究既不能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理论为指导，也不能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上解释文化现象，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研究不断深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二）关于判断文化价值的标准问题

在“文化热”中，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是讨论者普遍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有人说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因为西方一向重视物质文明，而现在西方却出现了“意识危机”，他们感到只重视物质文明不行了，开始向东方寻求精神文明，因此中国的儒学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得到复兴，因而提出“儒学复兴”说。另一种意见是说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进取型的，中国文化是保守型的，中国文化早就不该再继承了，只有西方当代文化才是中国建设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类型。当然参加讨论的多数论者，并不同意上述看法，而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其优劣，只是就具体优劣的看法和分析不相一致。

其实，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是个老课题，在戊戌启蒙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曾热烈讨论过。目前持论双方，大多数还是重复前人的老调，并无突破性的发展。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判断中西文化价值的标准不一致。有人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数作评价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化；也有人以中国文化为价值标准去评价西方文化，各执一端，结论相反。因此，要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必须先找一个公认的正确的判断文化的价值标准。

中西文化的比较，一般说是就观念形态文化的比较，而作为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观念文化，又反过来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要判断某种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否有价值，只能看它对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所起的作用如何。每种文化现象的价值总是同人类社会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相联系，人类社会是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绝不能把文化看成是一种超越历史、空无依傍的独立现象。因此，判断文化的价值标准应是客观的、具体的、变化的，而不应是超时空的、先验的、抽象的、僵化的。

以严复对西学的介绍而论，严复于19世纪70年代在英国留学，那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出版，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已广泛传播，成为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形态，而资产阶级文化形态从总的趋势看已开始走向衰落。严复回国后并没有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所介绍的是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说。然而严复却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

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之一。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刚刚出现近代资本主义，尚需要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做思想上的论证。严复在介绍西方思想学说时，突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准确地说介绍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从其产生起，就是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服务的反动理论，但它在近代中国却起到很大的进步作用，成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先进的中国人进行救亡图存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如不结合中西方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去抽象地评价社会达尔文主义或全部西学的价值，就很难做出客观的评价。

一种在古代起进步作用的文化形态，延续到现代可能完全是反动的。在世界上某种先进的文化形态，在一定时期对于某一国家来说暂时可能是无价值的。在某一国家是反动的文化现象，于另一国家可能会起进步作用。应该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转移，正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②。因此，在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时，必须将这两种文化放在某一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如在五四以前，有人说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是指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作用而言，含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当时中国的封建文化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正适合中国反封建主义的需要。但如由此引出一个脱离具体时空条件的普遍性结论，那就大谬不然。因为中国中世纪的文化并不比同时期的西方文化低劣。今天中国的文化又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③。

（三）关于文化比较研究中的可比性原则问题

将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比较必须遵循可比性原则，所谓可比性原则就是比较的两个对象（或多个对象）具有对等条件，如范围、时间、内容等方面的对等……这些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1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